

试论西汉货币结构的形成、演化及其与社会经济的关系

丁光勋

西汉货币结构问题是秦汉货币研究的新课题。过去诸多学者比较注重在钱币的重量、大小、形状以及钱文方面的研究,对货币结构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研究甚少,本文就西汉货币结构的演化、它同社会生产、交换、消费、分配结构的关系进行探讨,旨在揭示西汉货币结构变化的规律,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一、西汉通用货币结构的形成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也统一了中国的货币制度。规定黄金和铜两种金属为货币,废除了珠玉贝币和刀布钱,定面文记重的“半两”钱为全国统一的通用货币。西汉沿袭秦制,铜钱以重量命名。秦代这种“半两”钱的名词则一直沿用到汉武帝时期。

西汉前期货币发生过四次更迭,但始终没有跳出“半两”钱的圈子,形成“半两钱”的货币币面结构。刘邦即帝位“君临于下”,因“秦钱重难用,令民更铸钱”。^①即榆荚“半两”钱。《史记集解》引《古今注》:榆荚重三铢。1982 年在四川涪陵出土的汉半两多数为汉初正规榆荚。钱径最大的 2.36 厘米,小的钱径为 1.56 厘米,前者重 1.9 克,后者只有 0.7 克,最轻的仅为 0.3 克,大者 1.8 克,合汉三铢。榆荚“各随时而轻重无常”。^②高后二年(前 186 年),因榆荚半两太轻,铸行八铢,钱文曰:半两。应劭注:“本秦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即八铢也。汉以其太重,更铸荚钱,今民间名榆荚钱是也。”^③又于高后六年,改“行五分钱。”文帝五年(前 175 年),行四铢钱,钱文仍为“半两”,并废除盗铸钱令,允许民间自行铸钱。此政策

一直持续到景帝中元六年(前 144 年),后又禁止民间铸钱。^④西汉前期币制经几次变化,最终形成“秦半两”的币面结构。在其形成过程中,有以下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

第一,秦钱重难用,作何解释。

对“秦钱重难用”的解释,归纳起来有三种意见:一是货币数量不足,而制作新币^⑤;二是因铜料缺乏,托辞秦钱太重而改铸^⑥;三是半两为通行货币,币值比较高,却没有辅币,难于购买零星小件商品。^⑦就刘邦制荚钱的时间来看,正处楚汉战争时期,物价高涨“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人们连最低水准的生活也难维持,他们难在无钱,恐怕不存在钱难用的问题。刘邦让民铸荚钱,是用一种货币减重的办法,以“榆荚钱”替代秦半两使用,剥夺社会的财富,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以充军费开支。有无“辅币”问题,在西汉初并非至关重要。封建统治阶级他们不会考虑因百姓难于购买零星的小件商品而铸行一种新货币。应该说一种币制选择,当与社会经济有直接的关系。西汉初年币制,是一种金铜本位。黄金以斤为单位,一斤黄金等于一万钱,但铜钱不是辅币,它的使用没有受到任何限制,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是必不可缺的。汉初,并不是因无辅币,而铸行

① 《史记·平准书》
② 《史记·平准书》
③ 《史记·平准书》
④ 《汉书·景帝纪》
⑤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
⑥ 陈直:《汉书新证》
⑦ 王雪农:《汉初行荚钱之我见》

“荚钱”的。

第二,文帝五年颁行四铢钱,此钱足足使用了40年之久,西汉政府采用哪些措施用以保证四铢钱的稳定持续通行的。

首先是“立法钱”,即制定符合国家标准钱币。贾谊曾讲过:“法使天下公得顾租铜锡为钱,敢杀以铅铁为它巧者,其罪黥,然铸钱之情,非翫杂为巧,则不可得赢;……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从而弗呵乎,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①贾谊说的是汉文帝五年前后货币铸造与流通的情况,由此我们可作以下推断:

法令规定铸钱只准用铜锡,杂以铅铁或用其他不法行为降低钱的质量,要犯黥罪;国家制造标准钱,统一操掌铸币权,不然的话造币“市肆异用,钱文大乱”;在市场流通中,虽然国家制造标准钱,但各郡县仍然轻重钱并用,有的用轻钱,一百加若干个;有的用重钱,买者不愿一钱当一钱用。因民间私铸,国家制造标准钱不能解“翫杂”以坏币制的问题,只能既成事实,不合法钱标准的钱,一百个要加若干个来用。

其次,制“称钱衡”,用以监督货币的流通。1975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出土了文帝十三年(前167年)的“称钱衡”,衡杆正背下侧墨书42字:^②正为市阳户人婴家称钱衡,以钱为累,刻曰:“四朱(铢)”、“两”疏、“第十”。敢择轻重衡,及弗用,刻论罚,徭里家十日。衡文意即:此为发给市阳里“婴家”用于货币检验的称钱天平(衡),以法定标准重量“四铢”、“×两”作为砝码,并有凭证编号“第十”。如果敢选用轻衡或重衡,或不用规定的称钱衡者,就要罚以在本里服十天的徭役。与此钱衡同时出土的还有专用砝码,砝码圆环形,外径三厘米,重十七点七五克,按秦高奴铜权换算,重当秦汉时期十六铢,是法定四铢钱重的四倍。^③西汉文帝行四铢钱,以法钱为标准,同时制称钱衡予以监督,使四铢钱流通了整整40年,这有利于汉代前期经济的发展。对稳定西汉前期的货币结构有积极的意义。

西汉社会进入中期,币制又发生了多次变更: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行三铢钱,重如其文,使铜铸币的名义价值同法定重量相一致。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年)罢三铢钱,行半两钱,或称三分钱。传世的有廓四铢“半两”钱,就是武帝时的四铢“半两”钱。^④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重铸三铢钱,其重如其文,与建元元年的三铢钱制同,并造皮币及白金币。武帝元狩五年,又废三铢钱,令郡国铸造五铢钱。这种五铢钱,两面均有周廓,钱文“五铢”从此时起。^⑤武帝元鼎二年(前115年),令京师铸赤仄(侧)钱。一枚赤仄五铢,当五个郡国五铢钱,国家赋税收入,均用这种钱,^⑥非赤仄五铢以法律问罪。^⑦西汉一代铸钱种类最多的是在武帝一朝,在元狩五年前还是在“半两钱”上徘徊,经多次变更,最后形成了五铢钱制的币面结构。这种统一的五铢钱,共沿用了739年,直到唐武德四年(621年)才改铸,它在我国古代货币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西汉后期,王莽代汉托古改制,五铢钱制货币结构遭到破坏。据《汉书·王莽传》载,王莽先后进行过四次货币改革,更造大钱,错刀,布帛三类货币。刀币类有:“一刀平五千”,即金错刀。刀环上下有“一刀”二字,用黄金错镶而成,刀身上有“平五千”三字。又有“契刀五百”,刀环上铸有“契刀”二字,刀身上铸有五百二字。布类有“小布一百”、“公布二百”、“幼布三百”、“厚布四百”等10个品种。泉布类有六品:“小泉直一”、“公泉直二”、“幼泉二十”、“中泉三十”、“壮泉四十”、“大泉五十”,此6个品种中,除“小泉”、“大泉”外,其他几个品种都是比较少的。王莽在改币的过程中,还实行“宝货”制,货币的种类名色共有“五物六名二十八品”,其内容是五光十色,可以堪称为世界货币史上绝无仅有的奇景。^⑧纵观西汉中后期货币结构变化的情况,汉武帝时五铢钱币面结构的

① 《汉书·食货志》
② 《西汉称钱天平与砝码》,《文物》1977年第11期。
③ 《西汉称钱天平与砝码》,《文物》1977年第11期。
④ 《汉书·武帝纪》
⑤ 《史记·平准书》
⑥ 《史记·平准书》
⑦ 《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
⑧ 肖清,《中国古代货币史》

确立和王莽代汉时币制变换频繁,除了钱币本身的原因外,还有其它的因素。傅筑夫认为:汉武帝经常变更币制是他贯彻抑商政策的手段之一。^①但细读汉史文献,对傅先生的观点笔者不敢苟同。

武帝多次更换币制,首先要解决盗铸的劣质货币流通的问题。从建元元年起,就着手整顿币制,铸行重如其文的三铢钱制;后罢三铢钱,新造一种带有轮廓的半两钱;这是针对盗铸者磨取铜屑(磨钱取铢)的一种有效措施。武帝除采取经济手段解决“盗铸”问题外,还采用镇压手段。自汉武帝“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余万人。”^②西汉中期以后,货币私铸盛行,触犯了法律,官吏亦“不能尽诛取”。虽然汉武帝将郡国的铸币权归中央,专令上林三官铸,但那些“真工大奸”^③仍然在盗铸金钱。汉武帝不断地调整和选择货币政策,是试图用良币取代劣质货币,最终建立起统一的五铢钱制货币结构。其次,因西汉王朝长期同匈奴进行战争,财政支出大增,用货币减重的办法,向民众收取钱财,以补军需之不足。汉武帝时所制的皮币,用一尺见方的白鹿皮制成,它的法定价值为钱40万。王侯、宗室的朝觐,聘享必须持皮币。以前“王侯朝贺以苍璧,直数千”,现“皮荐仅四十万,本末不相称”。^④显然汉武帝制皮币的目的在于“摧浮淫并兼之徒。”至于王莽多次变换币制,除政治因素外,直接的原因是西汉中后期货币经济的恶化,国家经济危机。

由于货币的私铸,从昭帝时起,有些地方铸造的五铢钱的实重呈逐渐减轻的趋势。例如1957—1958年,在洛阳西郊墓中,共出土了一万多枚五铢钱,从中挑选西汉各个时期的标准钱十枚,逐一实测其重量,平均数为:武帝时每枚重3.35克;昭帝时每枚重3.26克;宣帝、平帝时每枚重3.07克。^⑤又如1978年在四川省威远出土的325枚五铢钱,情况也是如此。^⑥五铢钱减重的另一个表现是剪轮五铢和小五铢的出现。剪轮五铢又称磨廓五铢,被剪磨的程度不一,多至三分之二,余重仅1.2克。剪轮

五铢在西汉晚期开始在部分地区出现。1953年在洛阳烧沟墓中共出土1649枚剪轮五铢。^⑦1970年郑州新通桥汉墓,出土五铢钱二百枚,其中大多数为剪轮五铢。^⑧至于小五铢钱,其形制与五铢钱同而小。1954年在西汉白家口西汉土洞墓,1974年在江苏盱眙东阳西汉中晚期墓中均有出土。^⑨剪轮五铢与小五铢的出土集中在西汉中后期,足以说明那时货币状况的恶化。

王莽代汉后面临着“常苦枯旱,亡有平岁”,^⑩“比年饥馑”^⑪的经济形势。加上轻起边衅,与边疆少数民族进行战争,军费开支庞大,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府帑空虚,百姓匮乏”,^⑫社会经济即将崩溃。为了改变“官民俱竭,用度不足”^⑬的窘状,王莽亦采取货币贬值的办法,发行大面额货币,代替足值的铸币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去购买富豪大贾手中的黄金,搜括他们的财富,与他们争夺劳动人民的果实,用以弥补国家财政的赤字。王莽多次改币,所谓“五物六名二十八名”,这亦不失是西汉后期出现的一种货币结构。

二、西汉称量货币结构的形成

称量货币,又叫秤量货币,是一种使用或贮藏时必须称量的货币。马克思讲过:“当作价值尺度,并以自体或用物,当作流通手段来发生机能的,是货币。所以金(或银)是货币。”^⑭西汉时,已经使用黄金货币,其主要形状为金饼、马蹄金和麟趾金。

金饼是一种饼形的黄金铸块,须切割称量过后才能使用。西汉的金饼呈圆饼形,分大小两种。大金饼径一般为4.7—6.4厘米,以6厘

① 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二卷。
② 《史记·平准书》
③ 《史记·平准书》
④ 《史记·平准书》
⑤ 《史记·平准书》
⑥ 《四川威远出土大量“直百五铢”钱》《文物》1981年第12期。
⑦ 《洛阳西郊汉墓发掘报告》《考古》1963年第二期。
⑧ 《郑州新通桥汉代画像空心砖墓》《文物》1972年第10期。
⑨ 吴荣曾,《中国古代的货币》《考古通讯》1956年第4期。
⑩ 《汉书·食货志》
⑪ 《汉书·匈奴传》
⑫ 《汉书·王莽传》
⑬ 《汉书·王莽传》
⑭ 《资本论》第1卷,第125页。

米左右为常见,厚 0.82—0.9 厘米,以 1.2—1.5 厘米者居多,重 207.6—264.8 克,以 250 克左右为常见,即相当于西汉时一斤左右。在金饼上往往刻有文字,数字或自记重量,亦还有切割使用的现象存在。^①小金饼亦呈圆饼形,以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出土的最为典型。刘胜墓出土小金饼 40 枚,其径 1.7—2 厘米,厚 0.5—0.65 厘米,总重 719.4 克,每一枚平均重 17.99 克,相当于西汉一两强,窦绾墓出土小金饼 29 枚,其径 2.5—3.1 厘米,厚 0.2—0.35 厘米,总重 438.15 克,每枚平均重 15.11 克,相当于西汉一两弱,以刘胜墓和窦绾墓出土的小金饼为例,西汉的小金饼重量为一两左右。^②

马蹄金、麟趾金形制特殊,它们的出现有其特别的原因。《汉书·武帝纪》云:太始二年,诏曰:“有司议曰,往者朕郊见上帝,西登陇首,获白麟以馈宗庙,渥洼水出天马,泰山见黄金,宜改故名,今更黄金为麟趾、袁蹏,以协瑞焉,因以班赐诸侯王。”对此,应劭曰:“获白麟,有马瑞,故改铸黄金如麟趾、袁蹏以协嘉祉也。”其意思为:“麟趾”和“马蹄”金,是旧有金币的改铸。在这以前使用的金币,都是铸成块状,或饼状,使用时按需切割。有了这两种“祥瑞”,便将通常使用的金币改成麟趾和马蹄形状。麟趾和马蹄金是我国较早使用的黄金货币。1974 年 4—6 月,在西安上林苑旧址出土 6 枚完整的马蹄金饼,其中 4 枚底面为椭圆形,2 枚底面为圆形,前者为袁蹏,后者为麟趾。这 6 块“马蹄金”中编号为 82 的,自铭“斤六铢”,实测重 257.65 克,则汉一斤为 253.69 克;编号为 99 的,自铭为“十五两二十二铢”,实测重 251.9 克,则汉一斤为 253.22 克,汉金一斤约合今 250 克左右相符。^③关于西汉马蹄金、麟趾金的重量与含金量兹列表如下:^④

金币类别	重量(克)	含金量	备注
马蹄金	256.470	99%	详见附注
马蹄金	266.510	98%	详见附注
麟趾金	284.095	98%	详见附注
麟趾金	244.340	98%	详见附注

除黄金货币外,西汉在元狩四年,武帝还颁行了三种银币,即《史记·平准书》中所述的“白金三品”,其制即为:^⑤

品级	花纹	重量(两)	形制	值钱数
第一品	龙	8	圆	3000
第二品	马	6	方	500
第三品	龟	4	椭	300

“白金三品”又称“白选”,是在国家财政“用度不足”的情况下铸造的,与当时流通的三铢钱兑换。一枚龙纹白金币竟值三千枚三铢钱;一枚龟文白金币,也要值三百枚三铢钱。因为“白金币”面值高,吏民盗铸者仍“不可胜数”。^⑥因此封建政府还颁布“盗铸诸金钱皆死”的法令。^⑦慎阳侯栾买之因“坐铸白金弃市,国除。”^⑧由于各郡国“民多奸铸”,^⑨汉武帝颁行了由京师官铸的赤仄五铢钱,“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仄不得行”,这样“白金币”与赤仄五铢的折合率更为复杂。因此,“民弗宝用,县官以令禁之,无益,岁余终废不行”^⑩。“白金三品”铸于元狩四年,于元鼎二年就完全废止。此后,王莽改币时,还实行过“银货二品。”其为“朱提银重八两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银一流,直千。是为银货二品。”朱提:县名,属犍为郡,出善银。^⑪因朱提山出银,后世把“朱提”作为银子的代称。“流”又作“旒”,原为古代旌旗下的悬垂饰物。^⑫郑玄笺:“旒,旌旗之旒。”王莽改制师《周礼》,货币改革也同样,假借古名,用“流”作为银货的名称。

西汉的黄金是否属于货币?现在存在两种绝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意见认为:西汉的黄金“不论金币,马蹄金,或麟趾金,重量都比较规

① 甄燕:《试论秦汉黄金为上市》《中国钱币》1989 年第一期。

② 《满城发掘报告》上册。

③ 《西汉上林苑发现的马蹄金和麟趾金》《文物》1977 年第 11 期。

④ 《咸阳市发现的麟趾金和马蹄金》《考古》1980 年第 4 期。

⑤ 转引自《秦汉货币史稿》。

⑥ 《汉书·食货志》

⑦ 《汉书·食货志》

⑧ 《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

⑨ 《汉书·食货志》

⑩ 《汉书·食货志》

⑪ 《汉书·地理志》

⑫ 《诗·商颂·长发》

范,均在一斤或一两左右,所被切割的现象较为少见。但它们不是铸币,需要称量交易,即仍属称量货币。”^① 另一种意见认为:“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铜钱占流通主导地位的小商品经济中,它仅仅获得了依附铜钱的“金”的计量符号,却没有取得全面衡量商品交换价值的价值尺度职能,在市场上更没有流通手段的动态存在。它不具备严格的货币基本职能,它不是货币。”^② 笔者认为:西汉黄金应当属于货币。因为西汉的黄金已经具备了货币的多种社会职能,或者说具备衡量商品交换价值的价值尺度职能,这在《史记》、《汉书》的记载中是不乏其例的。在古代社会,普通百姓拥有的黄金的数量是极有限的,当他们的钱袋中还有铜钱时,是绝不会首先将黄金兑换使用。但决不能据此认为黄金不是货币。

三、西汉货币结构与社会经济的关系

西汉货币结构的形成同社会经济结构有直接的关系。经济结构,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它包括生产结构、交换结构、消费结构、分配结构、货币结构诸环节。其它环节的变化,都会影响西汉货币结构的变异。

西汉社会的基本经济成分是农业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结构。

农民是西汉农业的主要劳动者。西汉的自耕农,拥有自己的一块土地和生产工具,独立经营农业和手工业。他们是封建国家的编户齐民,有缴纳赋税和替封建国家服徭役的义务,成为中国封建经济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时期,地主占有大量的土地。他们把土地租佃给农民。“贯贷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数千家”。^③ 这些被役使的数千家,就是无地的佃农。西汉末,王莽行井田,限田政策就说过:“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④ 西汉的佃农受着地主对半租剥削。这种分成租剥削形态,是地主经济结构的主要形式,它限制佃农独立自由经营,阻碍生产积极性的发挥。西汉的自耕农和佃农是以一家一户为基本单位,他们不但要从事农业劳动,而且还要从事手工业生产,特别是满足生存的衣食生产,紧密结合于家庭内部,“男耕女织”就是他们的生活写

照。

西汉除农业这一生产部门外,手工业则是另一个重要的生产部门,构成生产力结构的基本内容。就西汉手工业生产结构而言,尚有官营、私营和个体三种形式。官营手工业其产品供皇室,政府官员消费,或作赏赐之用。上述手工业所生产的成品,不属于创造交换价值的商品生产,同商业资本不发生任何关系,完全供皇室和宫廷使用,或用以赏赐,它们不进入流通,亦严禁到市场上出售。私营手工业,是指那些专营煮盐、冶铁和纺织的富商大贾。如《史记》中记载的蜀郡的卓氏,“即铁山鼓铸。运筹策,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山东程郑“富埒卓氏”;张安世累为公侯,食邑万户,其夫人自纺织,家童七百人,“能殖其货,富于大将军光”。^⑤ 个体手工业,如周勃在秦末“以织薄曲为生”,(即是编席的小手工业者);“豉樊少翁”,豉大概是一种豆制品,樊少公是经营这种食品生产的。另外,西汉还存在数量不少的农村家庭手工业者他们以手工纺织为主,生产任务主要由妇女来承担,这种形式的生产,是农民经济生活的一个补充。

西汉私营手工业和个体手工业,都和国计民生有直接关系,其生产资料均属私人所有。个体手工业纯粹是家庭手工业,他们常常把技艺代代相传,世守家业。他们的生产带有自给自足的性质,产品不进入或只是极小部分进入流通过程,他们的商品生产部分,也只是一种为买而卖的交换价值形式下的使用价值生产。“处处从属于作为前提的消费,供给从属于需求,而且只是缓慢地扩大着”,^⑥ 仅此而已的商品生产,对西汉货币结构的作用是弱小的,影响也不会太大。那些富商大贾,经商累千金,乃至数十万金,成为“暴发户”,司马迁给他们一个“素封”的称号,他们对市场经济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西汉王朝自刘邦起采取抑商政

① 龙登高:《西汉黄金非币论》《中国钱币》1990年第3期。

② 龙登高:《西汉黄金非币论》《中国钱币》1990年第3期。

③ 《汉书·酷吏传》

④ 《汉书·王莽传》

⑤ 《汉书·张安世传》

⑥ 《马恩全集》第46卷上册第516页。

策,迫使一些富商大贾将商业资本转向土地,尤其是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以来,又行“算缗车”、“算缗钱”、“令民告缗”等措施,中家以上大部分破产,严重削弱了他们在货币经济中的作用,稳定了西汉的货币结构。

西汉的交换结构,取决于生产的发展和结构所决定。马克思指出:“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所决定。”^①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是西汉生产结构的基本形式。在这样一种经济结构中,他们向社会提供的商品直接决定他们对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需要。剩余产品有限,交换量也就有限。由这些分散的小农建立起来的“地方小市场的网”^②不可能形成大规模的商品经济的交换结构。占人口大多数的西汉农民不需要依赖商品市场,势必将商品交换的数量减小到最低点,市场只能以少数统治阶级为主要对象。但他们所需的不是一般的生活用品,而是奢侈消费品,这些产品大部分不是农民自己生产的,而是由那些“奇怪时来,珍异物聚”的贩运商从远道异域运来的,他们买贱鬻贵的不等价交易,来赚取价格差额利润,这不会引起生活用品物价的波动,从而对货币经济产生冲击作用。

西汉消费结构的形成,是同人们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环境等客观因素有关。在诸多的因素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和货币收入的多少,则直接影响西汉消费结构的变化。西汉人口的大多数是农民,他们的消费结构比较简单。饮食除谷粟类,茶酒外(饮酒是受限制的),还有面粉作为主食。《学斋杂记》载:“王莽始有啖面之文”。普通家庭的饮食习惯,放点盐豉,加点醋,有的还放点密和蔗浆,用蒜荬和芝麻调味;衣着方面,面料多用布,绌罗等,自己做成衫、袄、裳、裤。男女外套,通常多用裘皮,短褐则为贱着之衣。西汉百姓的生活是低水平的,这样的消费方式,消费支出的方向,不会对西汉的货币结构产生波动。可是,封建统治者的消费状况,与西汉普通人相比,有天壤之别。他们的消费结构完全是奢侈型的。在他们的倡导下,“时于下侈靡趋末,百姓多离农亩”^③大

大削弱了社会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并直接影响民风的转变。西汉法定货币为黄金和铜钱。铜钱用于民间,黄金主要用于统治阶级非生产性消费的支付上。据《史记》、《汉书》的记载,西汉黄金的用途:其一,用于统治阶级的赏赐和贡献上;其二,用于制作礼器、器饰和佩饰;其三,用于统治阶层交换珍异;其四,用于贮藏和死贮藏,表示富裕的程度。由此看来,西汉黄金贵金属货币结构的形式,似乎专为封建皇帝、皇室的赏赐和诸侯的贡献服务的。

分配,是把社会产品分归社会集团和社会成员的活动。包括生产资料的分配和消费资料的分配。而西汉掌管生产资料的分配和消费资料的权在治粟内史和少府手中。治粟内史,后改称大农令、大司农。其职责是掌管全国的田租(地税)和算赋(成年人的口税)等收入。至于大司农每年的收入,很难找到一个准确的数据,所桓谭说:大司农从全国收来的钱,一岁四十多万万。^④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将盐铁之权从少府转移到大司农,并在各地设置盐官直接掌管。这样,大司农的钱,就有较多的增加。少府,其职主要掌管“山泽市井之税”和口赋(童年人口税)等收入。西汉中期,汉武帝又从少府中分出一个专门掌管山泽的官署,长官叫水衡都尉。少府的收入一年是十八万万,水衡的收入二十五万万,加起来四十三万万,超过大司农收的钱。^⑤

大司农、少府和水衡都尉收来的钱如何分配?大司农的钱用作中央官署和驻京部队的开支,包括官吏的俸禄和军队的供养。大司农的钱半数用于官俸、半数藏于都内。西汉王朝官吏“自佐史至丞相,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他们根据职位的高低,用谷来支付。最高的是三公,号称万石;最低的是佐史,一年九十六石。^⑥汉代的官俸一部分给粮食,一部分给钱。钱和粮的比例,史无明确记载。^⑦少府和水衡

① 《马克思全集》第12卷第749页。
② 《列宁全集》第3卷第340页。
③ 《汉书·东方朔传》
④ 《太平御览》卷627引《新论》
⑤ 《汉书·何武王嘉师丹传》
⑥ 《汉书·东方朔传》
⑦ 《汉书·贡禹传》

和收入,作皇帝的“私奉养”,包括皇帝本人和皇室人员生活上各个方面的开支和用途。如果按桓谭所讲的少府收入约为大司农得钱数的三分之一,那西汉皇帝的耗费是惊人的。恩格斯曾经讲过:“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①以皇帝为首西汉统治集团,是最大的地主,他们可以凭借手中掌握的权力,操纵生产资料的分配和消费资料的分配。而生活在社会最低层的佃农、自耕农,他们的经济收入是一个可变量,由于封建剥削的苛重和小生产规模的限制,异常微小的剩余产品的份额,随时都有化为乌有的可能性。

西汉中后期出现的财政危机,它是生产不足与分配集中、积累减少和消费增加的矛盾的反映。其表现是地主财富高度集中,农民极端贫困,直接影响货币结构的稳定。从分配结构上看,地主阶级对小农剥夺过多,会使小农经济萎缩,从而使社会的总财富减少。这样,有限的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官僚地主、商人、高利贷者手中。在地主阶级内部,土地兼并日益加剧,封建国家与大地主之间围绕着地租的再分配展开激烈的争夺。土地占有、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是西汉社会三种经济形态,它们都是以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剩余产品作为生存基础的。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资料,地产自然成为社会财富最稳妥的生息形式。由于西汉土地可以买卖,自然加剧了土地兼并的程度,那些拥有货币财富的商人和高利贷者成为土地的买主,这就促使地产、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互相转化。西汉中期以来,官僚兼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逐渐形成三位一体的封建经济关系,他们成为左右西汉经济结构和货币结构变化的力量。

× × ×

综上所述,本文在分析了西汉货币结构的形成和社会经济的关系后,我们得出以下几点简短的结论:

1. 西汉封建统治者的过度消费是引起社会经济动荡,货币经济结构变化的原因。西汉

历史上出现过两次社会经济的动荡。一次发生在西汉中期,另一次发生在西汉后期,它们都跟封建统治者的消费过度有关。分析西汉两次经济波动而引起的货币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的因素,除天灾兵祸外,往往都是同封建阶级“竭民财力,奢泰亡度”^②有关。

2. 西汉货币结构的变化,同封建政府用政权力量的干涉和私人的伪造有直接关系。马克思指出:由流通过程本身所引起的金属货币的第二次观念化,或者说它的名义含量和实际含量的分离,一方面被政府,另一方面被私人冒险家利用从事各种各样的铸币伪造活动。^③

3. 五铢钱币制结构长期稳定流通七百多年,从货币文化上讲,这同西汉在货币铸造技术、工艺上的改进和提高是分不开的。在西汉以前,铸钱通常是用土范。西汉“上林三官”铸钱,用铜范,这样造出的钱大致齐一,对稳定西汉五铢钱币制结构起保证作用。对稳定西汉五铢钱币制结构起保证作用。

4. 西汉中期以后出现的实物论思想是货币币值不稳定引起的,它是价值规律自发作用下的产物。在西汉货币结构中有通用货币结构黄金贵金属货币结构,还有用实物取代货币。实物取代货币的形式为“布帛”(用于赏赐)“谷物”(用于官俸,“半钱半谷”)^④王莽杂用布帛金粟。在正常年境,实物取代货币比较少,尚未形成一种货币结构。就西汉中期以后出现的实物论思想来看,它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还是由于货币铸造减重,引起币值的不稳定,给人们经济生活上带来损失和痛苦。这种损失和痛苦同样波及到像贡禹这样“有田百三十亩”的中小地主^⑤,从而使人们经济实物化状态意识增强,所以贡禹率先提出废钱用谷帛的主张。因此,笔者认为:西汉的通用货币,称量货币是构成西汉货币结构的基本形式,以实物取代货币是在非正常年境中出现的,并未在流通中占主导地位,不能称之为一种货币结构。

① 《马克思全集》第三卷第307页。
② 《汉书·夏侯胜传》
③ 《马克思全集》第13卷。
④ 《后汉书·百官志五》
⑤ 《汉书·贡禹传》